

论金元之际东平文人的词赋之学

赵忠敏

(浙江大学 中文系, 杭州 310028)

摘要: 金元之际的词赋之学,是赋体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阶段。词赋创作并未随金朝灭亡而中断,而是在严实父子统治下的山东东平地区再度勃兴。受金代科举遗风影响,东平府学教育和选拔即以词赋为重,东平文人自觉地继承金代词赋之学,并以此作为晋身之阶。他们在新朝翰林职位上占据着较大的比重,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基于对前朝文风的反思,东平文人以儒家文学观为标榜,致力于革除金代词赋之弊,为元初文坛的健康发展建立了良好开端。

关键词: 金元之际;东平;府学;词赋之学

中图分类号: I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09)05-0111-05

金元鼎革之际,中原战乱频仍,知识分子辗转流离,文化载籍大量缺失,精神遗产蒙受了巨大灾难。然而,在这场浩劫中,北方某些区域却因“汉地”世侯的兴起,文化得到较好的保护和发展。其中以雄踞山东东平地区的严实父子最为引人注目,他们以保境安民为号召,恢复地方经济,形成了东平相对安定富足的局面;兼之收容大批金代遗民文人,招揽人才、发展教育,遂使东平文化呈现上承前金遗风、下启元初新貌的局面,在战乱中护持文化命脉于不坠,蔚然成为北方文化重镇。目前学术界对于金末元初东平文人群的研究,主要侧重从史学角度研究严实父子兴学养士的事迹,文学方面则有对东平元杂剧创作的探讨^[1-3]。而对当地词赋创作则一直没有给予关注。显然,东平地区的词赋创作在金元词赋发展史上,正处于一个交接过渡的特殊时期,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与地位。本文拟从金代文学的余波和影响出发,考察东平地区文坛创作的总体局面,探讨其在继承金代词赋之学的基础上,对金末文风之弊的认识与改良,冀以对东平府学的成就做出更全面的认识和评价。

一、东平词赋之风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词赋之学,从汉赋演变而来,后被唐宋科举制度采纳,成为一种考试文体。金末元初的东平词赋之风,与金代科举遗风有着密切的关系。金代科举考试中,经义、词赋、策论三科中试者皆称进士,此外还有律科、经童、武举等科。其中最主要的是词赋、经义二科,且前者的地位比后者更为显要。早在金初“南北分选”之时,被录取的词赋进士就比经义进士多;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甚至取消经义,专以词赋取士;直到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88),经义考试才得以

恢复,但此后经义科仍不能与词赋科相抗衡。总之,词赋科在金代科举诸科中最受朝廷重视,竞争也最为激烈。具体来说,词赋考试包括诗、赋、策、论四题,目的是选拔出四者俱工的全才,“赋以择制造之才;诗以取风骚之旨;策以究经济之业;论以考识鉴之方”^[4]。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考官偏重“赋”而轻“诗”、“策”、“论”,遂使“赋”逐渐大行其道,“诗”、“策”、“论”则形同点缀。“赋”即律赋,是一种在词藻、对偶、用典、韵律等方面有着严格规定、散韵相间的文体。主考者“重赋”的取向,足以改变科场风向,于是地方教育普遍采取“止力为律赋,至于诗、策、论俱不留心”^[4]的教学方法,将律赋作为应付举选的重点而勤加演练。直到金朝末年,词赋依然盛行:“时金将亡,儒者犹习文辞为进取计”^{[5]40册:199};金亡之后,遗老儒生纷纷“说经正传疏义,为文尽习律赋”^{[3]第40册:348},这表明词赋的生命力直到金元之际仍未见衰退。

金元之际词赋的盛行,除了受到金代学术风气影响外,还有着更为直接的原因:即在局部区域,它再次担当了人才选拔的标尺,成为文人晋身统治阶层的阶梯。词赋之所以未能在“全局”充当标尺,主要是因为蒙古入主中原后,长期没有开设科举的缘故。虽然它也曾举行“戊戌选士”,为蒙金战乱中沦为奴隶的儒士确定“儒籍”,但此后这类“选士”由于种种原因再未举行,从而使有心用世的文人,也深感前途堪忧。在中原传统的人才选拔机制中断的情况下,已在金代享有盛名的学者如王磐、宋子贞、徐世隆、李昶诸人,尚能凭借在前朝的声望,先受严实父子、后为蒙古统治者所知遇。而对于大批既无名声,又无儒籍的后生晚辈来讲,则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生计与出路问题。于是大多数普通文士便把希望寄托于严实

收稿日期: 2008-07-29

作者简介: 赵忠敏(1982—),男,博士研究生。E-mail: joyzhongmin@eyou.com

父子兴建的东平府学,期望能给人生带来转机。

与蒙古统治者不同,作为“汉地”世侯的严实父子及其幕客,仍然倾心于以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于是他们创办的地方府学,便多少具有了科举性质。府学每年都举行考试,多次考试成绩优异者,不仅免除赋税,还将被幕府擢用^{[6]251}。而衡量人才的标准,仍是词赋能力的高下。比如府学生申屠致远“课试中选,官复其家”^{[5]第15册:436};王构“弱冠以词赋中选,为东平行台掌书记”^{[7]3 855};府学生阎复、孟祺也都因成绩优秀,担任过东平行台掌书记一职,等等。这样,在中央封闭科举道路后,词赋在东平这一局部区域里,再次为身处窘境的文士提供了晋身的途径。

受上述文化与现实因素的促进,词赋在东平逐渐呈现中兴的态势。在这个复兴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寓居此地的大批遗民文人。他们在战乱中归附严实父子,致力于当地文教,并参与创建了著名的东平府学;在学术上,他们承袭金代遗风,故能以词赋启迪后学;他们人数众多,故能使词赋研习渐成规模。所谓“齐鲁之士踵金辞赋余习,以饰章绘句相高”^{[5]第40册:270},便是在诸多文人带动下,当地词赋风行的真实写照。而此后大量文章之士的涌现,及其在蒙元朝廷形成的声势,则是东平文人对金源文风借鉴和发展的结果。

总之,东平词赋之风的盛行,是由于金代遗留的文化风气、东平实行的人才选拔政策、文人对个人前

途的追求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三种因素中,金代科举遗风是导致词赋盛行的主要原因;东平幕府选择词赋作为考试手段,也是在这一既定文化的前提下采取的选拔政策;而处在时代漩涡中的文人,则不得不接收和顺应特定的文化背景。他们对于词赋的追求,除了纯粹的文化动机之外,还有着对自身前途的思索和现实的功利目的。

二、东平词赋创作群体考述

东平是金末文风余波流行的主要地区,大批滞留当地的金遗民文人,构成了词赋传承的重要群体。他们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成为台阁新臣的府学生,词赋既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工具,也是评价其创作成就的主要依据。东平文人群在当时的影响力甚大,正如元至元二十年(1283)胡祗遹所说:“即今内外要职之人材,半出于东原府学之生徒。”^{[5]第5册:348}元大德初年(1297)袁桷亦称,翰林院、国子监等清望机构中“东平之士,什居六七”,且“所与交多东平,他郡仅二三焉”^{[5]第23册:210}。这种现象距严实父子兴办府学,已有二三十余年之久,但东平文士后来在元代身居要职,正是严实父子及其幕客振兴教育、开风气之先所致。擅长文词确乎也是东平文人的一种群体共性,兹以表格的形式,罗列其中14位有代表性的人物(表1),以备考察。

表1 东平文人代表性人物仕履情况

姓名	相关仕履情况	出处	备注
王磐	入元曾任翰林直学士、翰林学士	《元史》卷一百六十《王磐传》	东平府学教官
宋子贞	入元曾任翰林学士	《元史》卷一百五十九《宋子贞传》	掌管东平府学学校事务
徐世隆	入元曾任翰林侍讲学士	《元史》卷一百六十《徐世隆传》	东平府学师长,教授并考核学生
李昶	入元曾任翰林侍讲学士	《元史》卷一百六十《李昶传》	东平府学教师,讲授《春秋》
李谦	经王磐推荐入朝,曾任应奉翰林文字、翰林直学士、翰林承旨等职	《元史》卷一百六十《王磐传》、《李昶传》、《李谦传》、《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太常徐公》、阎复《乡贤祠记》	曾师李昶、康晔 ^① 、徐世隆
阎复	经王磐推荐,任翰林应奉文字,历翰林修撰、翰林学士,集贤学士等职	《元史》卷一百六十《阎复传》、《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太常徐公》	曾师康晔、徐世隆
孟祺	经王磐、宋子贞推荐入朝,先后任国史院编修官、应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等职	《元史》卷一百六十《孟祺传》、《王磐传》、阎复《乡贤祠记》、《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太常徐公》	曾师康晔、徐世隆
徐琰	曾受王磐推荐入朝,入元任翰林学士承旨	阎复《乡贤祠记》、《元史》卷一百六十《王磐传》	曾师康晔
张孔孙	入元任元朝集贤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等职	《元史》卷一百七十四《张孔孙传》、《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太常徐公》	曾师徐世隆
刘庚	入元任应奉翰林文字、翰林直学士、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承旨	《元史》卷一百七十四《刘庚传》	曾师王磐
夹谷之奇	入元任翰林直学士	《元史》卷一百七十四《夹谷之奇传》、《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太常徐公》	曾师康晔、徐世隆
李之绍	曾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翰林待制等职	《元史》卷一百六十四《李之绍传》	曾师李谦
王构	曾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翰林修撰、翰林侍讲学士、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等职	《元史》卷一百六十四《王构传》	曾入东平府学学习
王恽	曾任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翰林待制,翰林学士	《元史》卷一百六十七《王恽传》	曾师元好问、王磐

①康晔,字显之。金代词赋进士。他曾任东平府学儒林祭酒,并讲授《尚书》。他的学生极多,事迹见于阎复《乡贤祠记》/全文(卷295)。江苏:凤凰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249-250。

表1中所列王磐、宋子贞、徐世隆、李昶四人均
为东平府学师长,他们在金代已享有文名:王磐为
金进士,“文辞宏放,浩无涯涘”^{[7]3 751};宋子贞“工词
赋”^{[7]3 735},被元好问称为“以文章名海内久矣”^{[8]761};徐
世隆兼擅诗、古文、奏议等多种文体,四六文“骈俪亲
切,无牵就支离之弊”^{[6]254};李昶是金进士,十六岁“已
能为程文”^{[7]3 761}。其余如李谦、阎复、孟祺、徐琰诸人便
是王、宋等人在东平培养出的后起之秀。李谦幼年“为
赋有声”,进入翰林后“一时制诰,多出其手”^{[7]3 767};徐
琰、孟祺、阎复与他齐名,并称“东平四杰”;王构“文章
典雅”^{[7]3 855};李之绍为文“援笔立成”^{[7]3 862};刘赓在元“久
典文翰,当时大制作多出其手”^{[7]4 063}。翰林院作为拟定
诏书、典章制诰、备顾问的机构,文才出众者方能胜
任,东平文人受到朝廷重视,可见他们确有这方面的
突出才能。换句话说,他们擅长的词赋之学,使其在新
朝可以有有用武之地。东平文人正是以府学所习词赋
作为入职翰林的津梁,而后又将词赋之风吹进了元初
文坛。另外,从他们入职翰林的人数之多,又可以想见
当时东平文人写作词赋之盛。可惜他们的作品今已大
量失传,惟王恽有《秋涧先生大全文集》传世。

正如前文所述,蒙元统治之初,科举之法未被用
于选拔人才,在这种情况下,士子若能被朝臣荐举,
自然更容易获得入仕的机会。因王磐、宋子贞、徐世
隆、李昶身兼翰林重臣与东平府学师长的双重身份,
其门生入仕朝廷便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例如表中
所举李谦、孟祺、徐琰、阎复四人,就是通过王磐引荐
而仕元。因此,师门关系纽带显然是东平文人大批占
籍翰林的重要原因。当时就有人对东平文士荐引同
类、任职翰林的目的进行过揭示:“士乐得所依,连汇
以进,各以其所向,上有以挽之,下有以承之,势使
之然也。”^{[9]第 23 册:210}可见东平文士因举荐而入朝者
应当不在少数。虽然荐举带有寻求政治同盟的意味,
但范围却多在翰林院等文职机构。这正说明擅长词
赋仍是东平文士进入官场的一种重要学历资本。

三、东平文人对金末文风的改良

尽管词赋的生命在东平文人手中得到延续,但
其成就和水平已不能和前代相比;同时,受金代词赋
创作积弊的影响,这种文体也必然走向末势衰颓。东
平文人对金末文风的传承过程中,曾有过深刻的反
思和改良,使得当时文风出现了一些新变。下面以
阎复致某提学郎中的一札书信为例,以此探讨东平
文人改革词赋的实绩。为了方便说明问题,兹录《谢
解启》全文如下:

①金代早期的考试分为乡荐、府试、省试三级。其中府试相当于明、清的乡试,考中者称“府解”;乡荐级别低于府试,不同于后世的乡试;省试相当于明、清的会试。金章宗明昌元年罢乡试后,科举基本定为府试、会试、殿试三级。东平府当时仍承袭金代的考试制度和称谓,故该信表明阎复刚参与府试一级的选拔。

芹宫角艺,初无黄绢之辞;藻鉴垂光,误中青
钱之选。名非情称,感与愧并。窃惟辞赋之渊源,
是乃古诗之糟粕。荀氏子发明其大概,宋大夫鼓
舞乎后尘。英华秀发则洛阳少年,文彩风流则临
邛词客。自兹以往,作者寔多。摘章绘句者,往
往有之;操纸染翰者,滔滔皆是。若孙绰擅声金
之美,子云韬吐凤之奇;二班父子卓冠一时,陆
家兄弟独步当世。莫不振金石铿锵之调,穷雾
谷组丽之文。大而仁义讽谕之至言,细而鸟兽
草木之多识。禁逾侈则有《东京》、《西京》
之作,辨时事则有《吴都》、《蜀都》之编。或
上林以讽其畋游,或《甘泉》以述其郊祀。升
堂入室,然未窥孔氏之门墙;宣德通情,亦庶
几风人之旨趣。何此源流之降,演为科举之
文。一变唐宋,尚余作者之典刑;再变辽金,
无复旧家之风骨。拘之以声律之调畅,检之
以对偶之重轻。以窘边幅为谨严,以黏皮骨
为亲切。描题画影,但知一字之工夫;抹东涂
西,不觉六经之破碎。习非成是,以变为常。
事驰骤者,辄谓之荒唐;务雄贍者,例云乎
唱叫。虽子建胸中之八斗,不得骋其才;虽少
陵笔阵之千军,无以施其勇。然有司之获选,
亦壮夫所不为。何承平历世而来,莫之敢指;
盖侥幸一第之外,孰知其它。必待权衡至公
之流,庶展琴瑟更张之手。

伏惟提学郎中,先生儒林冠冕,学海宗盟。
悯斯文重厄于秦灰,赞东国复修乎泮水。甄
陶后进,殿最于春秋二季之间;鉴视前车,洗
涤乎场屋百年之弊。俾削拘挛之态,庶还丽
则之风。格虽守而必文辞之可观,辞虽尚而
亦义理之为主。加程文律,度于古今骨格之
内;取古今气,艳于程文规矩之中。自非卓尔
不群之才,曷其裒然举首之选。

如复者,青衿小子,白面书生。学浅鲜而
不根,气蕞蕤而易涸。文惭七步,才愧八叉。
仅知弄笔以作文,未免寻章而摘句。五音中
度,敢论掷地之宫商;八表神游,安有凌云之
气象。聊作战蜗之两角,尚惭窥豹之一斑。鼯
鼠之穷,顾将奈何;黔驴之技,盖止此耳。岂
意不以菲葑之下体,遽令糠秕以先扬。敢不
益砺操修,重鞭鄙钝,进而不已,雄以当前。
庶取百中之功,不负千金之顾。铭心鹄路,
谢九秋桂子之风;刮眼龙门,看三月桃花之
浪。^{[9]第 9 册:234-235}

据该文篇名可知,“解”应指府解,“谢解启”
就是阎复获得府解的感谢信^①。创作时间大致
在元宪宗五

年(1255)^①。此文历数赋的流变轨迹,认为它从荀子发端,经两汉、六朝,产生了诸多的名家名作,对社会产生过积极作用;但自唐、宋迄辽、金,赋开始演变成科举程文,也就江河日下矣。进而,文章对金代以来词赋弊端作了具体揭示,如只重声律、对偶、词藻、章法、用字等形式,而没有以六经为根本,缺少风骨;由于格式过于严谨,已束缚到作家的创作个性,使他们难以自由阐发思想、抒发情感。欲不拘一格者便被斥为“荒唐”、“唱叫”,从而导致文坛创作缺乏生机和活力。总之,阎复对词赋的批评指摘均切中要害。但他当时尚在弱冠之年,涉世未深,且未亲历金代科举。他之所以能历数前朝“百年场屋之弊”,恐怕更多要归功于府学师长的影响。

东平文人对金代文风弊病的反思和矫正,从阎复致信的对象——某提学郎中处即可窥见一斑。提学郎中,即提举学校官,掌管一路学政,主持府试,选拔人才。据上文“儒林冠冕”、“学海宗盟”云云推测,此人无论在东平,还是在整个北方都享有崇高威望。尽管阎复没有交待“提学郎中”确指何人,但他在东平的业绩却是值得肯定的,如“鉴视前车,洗涤乎场屋百年之弊”的举措,无疑是针对金朝浮华文风的改良。他可称作是有志于革除文弊的东平文人代表。具体到改良本身而言,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复古色彩已初露端倪。这种复古首先表现为思想内容上对“丽则之风”的恢复。“丽则”见于扬雄《法言》,即“诗人之赋丽以则”的缩略。扬雄针对唐勒、宋玉、枚乘诸人辞赋过分铺张,以致丧失讽谏功能的情况,主张以“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经》精神贯穿赋的创作,从而达到既华丽铺张,又内容充实的效果。东平文人重以“丽则”原则相号召,无疑是看到词赋只重形式、空洞无物的弊病后,在创作观念上所作出的实践。

时任东平府学师长的诸人,除了文人身份,大多身兼儒生身份。宋子贞出身于儒学世家,“经明行修,盖故家遗俗然”^{[8]761-762};康晔“六经子史无所不窥,发为词章,仁义之言藹如也”^{[5]250};李昶精通《春秋》,曾著《春秋左氏遗意》二十卷^{[7]3 763};王磐精通理学,“程、朱性理之书,日夕玩味”^{[6]246}。正是这种学术上的儒学根柢,使东平文人在恢复“丽则”之风时,易于将儒家思想贯穿入赋,以支撑文章结构。阎复信中所提“格虽守而必文辞之可观,辞虽尚而亦义理之为主”,便是儒学对赋从思想内容上进行改造的具体表现。至此,赋在经过长期流衍变迁,走上律赋的狭隘道路

后,最终又回到对“丽则”原则的恢复。虽然在创作观念上,这算不上是对前人的创新,但却有利于打破程式的束缚,扩大创作空间。

东平文人对词赋的改良,还体现在摆脱了律赋的狭小空间,将范围扩大到多种形式赋的创作。关于金末元初词赋作品的流传情况,正如清人李调元在《赋话》中所述:“金自大定改元,颇重进士,历年所命诗赋题,及状头名氏,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甚详,而赋罕有流传者。”^{[9]66}可知由于作品的散佚,后人很难通过文本进行分析。即如在元代享有盛名的学士王恽,观其《秋涧先生大全集》,真正以赋名篇者也仅有十篇,但这些作品无一沾染当时律赋的弊病,而是倾向于广泛吸取前代赋体的风格与技巧,下面试以具体篇目为例:

(1)《三峰晴雪赋》、《吊廉将军墓赋》为骚体赋,通篇一韵到底。

(2)《登常山故城赋》、《鹤媒赋》为四言诗体赋,且自由换韵。

(3)《玄猿赋》、《蛾眉砚赋》、《茹野菊赋》学习南朝骈赋。其中《玄猿赋》题下注云:“效庾开府体。”^{[5]13}即以南朝庾信为取法对象,其文以四六为主,对仗工整,且用几组七言诗句开篇,从中隐约可见庾信《春赋》的影子,明显具有南朝骈赋的特点。

(4)《蟠木山赋》、《未央瓦研赋》学习唐宋律赋。前者除了四六对仗外,还运用长句、隔句对,结尾用漫句,这些都是唐宋律赋常见的句式。后者也吸收了律赋壮、紧、漫等句式,但其间多有单行散句,故不能目为律赋。

(5)《熙春阮赋》接近宋文赋。以工整的四六对为主,又兼有三字、五字、七字、八字散句贯穿其间,使文章流动而不板滞,且篇末夹杂议论,都符合宋文赋的特征。

总之,从王恽的赋可以看出,他已不再局限于律赋这个狭小范围,而是广泛涉猎凡骚赋、骈赋、文赋等,体裁不一,这就与上引阎复所述“加程文律,度于古今骨格之内;取古今气,艳于程文规矩之中”的改良方向颇能吻合。

东平文人摆脱律赋束缚,有意复古的倾向,也较能代表此后元赋的发展方向。元赋在此后的发展中,大致体现出重“古”而轻“律”的特点。元仁宗延祐年间重开科举,曾改试律赋为试古赋,表明朝廷对古赋的推重;而文人创作也多采用古赋体裁,祝尧曾著

①据《元史》阎复本传记载:“(复)弱冠入东平学。时严实领东平台,招诸生肄进士业。迎元好问校试其文,预选者四人,复为首。”可知阎复在这次选拔中独占鳌头,正是《谢解启》中自述“褒然举首”、“糠秕先扬”之经历。另据《元遗山年谱汇纂》“宪宗五年乙卯”条,该年二月,东平府新学即将落成,严实济致信聘元好问作学记,选拔人才;八月,元好问自真定往东平,校试阎复等人的文章,则时间恰与《谢解启》中提到的“九秋桂子之风”相符。根据府学制度,考试屡中高选者,即被擢为幕府官,不必再参加府试。因此,该信写作的背景就是《元史》阎复本传所载的东平府试,具体时间当在元宪宗五年(1255)秋。

《古赋辩体》，认为古赋比律赋更能表达作者内心思想，并提出“祖骚而宗汉”的主张，对此后文人创作古赋产生了指导作用。与之相反，长期作为科举文体的律赋，一旦为科举摒弃，也就丧失了存在空间，因而备受冷落，以致李调元称“律赋至元而中息矣”^[9]。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东平文人群以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从事着文化的自救和重建。一方面，他们受金代科举制度的影响，表现出侧重词赋创作的倾向，自觉延续着这一文体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他们对前代词赋的弊病都有清醒的认识，曾试图改变当时文风不振的现状，对元初文坛的健康发展起到引导作用。东平文人不仅是词赋创作的主体，而且也是文风改革的先驱，对扭转金末词赋之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安部健夫. 元代的知识分子和科举[A]//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五卷)[C]. 北京:中华书局,1992:636-679.
- [2] 晏选军. 严实父子与金元之交的东平文化[J]. 殷都学刊,2001(4):54-58.
- [3] 陈高华. 元史研究新论[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 [4] 刘祁. 归潜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5] 李修生. 全元文(第40)[Z]. 江苏:凤凰出版社,1999-2004.
- [6] 苏天爵. 元朝名臣事略[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 [7] 宋濂. 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 [8] 姚奠中. 元好问全集[Z]. 山西: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 [9] 李调元. 赋话[Z]. 清乾隆刻嘉庆重校印函海本.

A Study of The Dongping Scholars' Cifu Learning between Jin and Yuan Dynasties

ZHAO Zhong-min

(Department of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Abstract: The Cifu Learning between Jin and Yuan Dynasties, is a special stage in the history of cifu development. The cifu creation didn't die off with the Jin Dynasty ended, but re-emerged under the rule of Yan Shi and his son in Dongping. By the impac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Jin Dynasty, The education and selection of Dongping state-run school that was focused on cifu. Thus made The Dongping Scholars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cifu Creation. They kept a large proportion in the Imperial Academy in new dynasty, This is also a remarkable cultural phenomenon. Based on the reflection on Style of writing in former dynasty, The Dongping Scholars regarded Confucian view of literature as creation standard, they concentrated on reforming disadvantages of cifu in Jin Dynasty and, created a good beginning of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writing style in new dynasty.

Key words: between Jin and Yuan Dynasties; The Dongping Scholars; state-run school; Cifu Learning

[责任编辑:孟青]